

A STUDY ON  
RONGGLU  
AND  
LATE QING POLITICS

# 荣禄与 晚清政局

马忠文 ● 著



榮祿 (1836 — 1903)

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

管理神机营大臣、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工部尚书、西安将军、督办军务大臣、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谥“文忠”。

# 荣禄 与

# 晚清政局

A STUDY ON

RONGLU

AND

LATE QING POLITICS



马忠文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忠文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097 - 8894 - 3

I. ①荣… II. ①马… III. ①荣禄(1863~1903)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1809 号

---

## 荣禄与晚清政局

著 者 / 马忠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赵 薇 邵璐璐 孔 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9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894 - 3

定 价 / 6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马忠文同志的新著《荣禄与晚清政局》，顾名思义，着重探讨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课题：一个是晚清政局中的荣禄，一个是从荣禄的处境和作为来考察晚清政局。这是两个问题，也是两种视角，对深化近代史研究十分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部新著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推进，值得重视。

荣禄在晚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可谓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荣禄不是宗室亲贵，但他一生最后几年却身膺首席军机大臣，又被授以文华殿大学士，位高权重，这在晚清历史上实属罕见。

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除了简略的官修传记和几篇碑传文，没有一部有关荣禄的完整而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传记或专著。当然，这也并不奇怪。最大的困难在于：有关荣禄的历史资料极为散乱，既没有人为他编过稍完备的文集，也没有年谱长编之类的资料集。庚子事变中，他的府第被焚毁，自己保留的早年文稿、往来书信、档案等文字资料都付之一炬。如果要对荣禄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就得拿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从搜集散见各处的原始资料做起，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细心比较和考证，去伪存真，做好扎实的资料基础，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只是这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比起研究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所需花费的工夫要多得多，难免使人望而却步。

忠文同志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知难而进。他熟悉晚清朝政掌故，著有《晚清人物与史事》，在确定荣禄研究的选题后，又花了极大精力，奔走各地，细心搜寻查阅资料，诸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所藏清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传包档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醇亲王、李鸿藻、张之洞、鹿传霖档案，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有关人士如翁同龢、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荫桓、王文韶、廖寿恒、那桐、荣庆、陈夔龙的文集、日记、书信、笔记、年谱，以及报刊文献等，每有所得，如获至宝。在尽可能占有详尽资料的基础上，忠文同志经过严谨细致的比核梳理，终于比较完整而清晰地再现出荣禄一生的基本经历和关键时期的思想活动。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此中甘苦，诚如古人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史家论述历史人物，应力求做到能够知人论世。忠文同志这部新著，比起他以往的研究，明显又前进了一步。他不只是停留在对历史人物个人经历的微观剖析，而是力求扩大视野，透过荣禄的研究，对晚清朝政的全局有比较宏观的考察，并做出自己的论断。

这些论断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他认为甲午战后的变法浪潮，包括戊戌变法在内，并不只是围绕康、梁的维新运动展开的，而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朝野各方寻求救亡自强出路的产物。甲午战后的变法，既有康、梁等要求的以日本、俄国为榜样的激进改革，也有清廷自上而下推行的以练兵、开矿、修建铁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也就是洋务派式的改革）。荣禄当属于后者。以往受到康、梁宣传的影响，学界对于清廷的实政研究关注明显不够。二是清末新政所以没有根本性的进展，同甲午战后清廷财政枯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情况有关。以往对晚清朝局的研究也比较薄弱。本书用很多篇幅描述辛酉政变后统治集团高层内部的分歧与矛盾：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真正看重的是个人权力；满洲宗室中的恭王、醇王、端王、庆王等各有怀抱，在地位上此起彼伏；满洲大臣中，荣禄和刚毅相互对立，明争暗斗；汉族大臣中，先有李鸿藻、沈桂芬为首的“南北之争”和清流、浊流之争，光宣之际又有袁世凯、盛宣怀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如此不一而足。像清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那种朝气蓬勃、敢有作为的气象几已荡然无存。就是当时被人称为“有血性”的能臣荣禄，也贪恋钱财，唯慈禧马首是瞻。读者不难感到，对这个暮气沉沉的封建王朝已难寄期望。

当然，带有开拓性的探索不可能尽善尽美。作者的有些论断和叙述是否恰当，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讨。以荣禄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来说，当他进入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时候，清朝已面临王朝末日。他病逝不到十年，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统治终告覆亡，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告结束。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在此前十多年早见端倪，但书中的论述和分析尚不够到位，似乎还不能使读者对将要到来的历史巨变产生强烈的预感。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一本书中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许可以唤起更多史家一起做进一步的探索。

金冲及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

#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家世及出仕	020
一 家族与家世	020
二 难荫入仕	025
三 投效神机营 密结醇亲王	031
第二章 光绪初年的宦海沉浮	037
一 迭膺重差	037
二 北派底色与荣、沈公案	043
三 退出官场	052
第三章 赋闲与复出	061
一 醇王当政与荣禄开复	061
二 与李、翁关系的亲疏异同	068
三 出任西安将军	075
四 甲午战前与汉族官员的关系	087

第四章 甲午督办军务	097
一 提督九门 督办军务	097
二 反对汉纳根练兵	105
三 清议与宫闱之争	110
第五章 马关议和后的朝局动荡	115
一 中枢与北洋权力的调整	115
二 慈禧对清议的整肃	121
第六章 督办军务与荣禄权势的扩张	138
一 裁勇与军事改革	138
二 袁世凯编练新军	141
三 荣禄权势的骤升	149
第七章 胶、旅事件前后	158
一 外交危机与翁同龢开缺	158
二 荣禄与戊戌年武科改革	169
三 对康有为的疏远与敌视	174
四 总督直隶	179
第八章 戊戌政变	195
一 百日维新后期的朝局与慈禧训政	195
二 调和两宫 缓和局势	212
三 建立武卫军	218
第九章 己亥建储前后的党争与政争	226
一 新旧、满汉及荣刚之争	227



二	康、梁及东南沿海反对废立、攻击荣禄的舆论·····	235
三	己亥建储与庚子年初的朝局·····	244
<b>第十章</b>	<b>庚子事变·····</b>	<b>252</b>
一	义和团兴起与清廷的应对·····	252
二	联军入侵与清廷宣战·····	259
三	京城陷落后荣禄的抉择·····	284
<b>第十一章</b>	<b>从主政西安到返回京城·····</b>	<b>299</b>
一	庇护董福祥·····	299
二	回銮前荣禄的处境·····	308
三	返回京城与自请罢斥·····	314
四	荣禄病逝与时论评价·····	319
<b>结 语</b> ·····		<b>331</b>
<b>参考文献</b> ·····		<b>338</b>
<b>主要人名索引</b> ·····		<b>352</b>
<b>后 记</b> ·····		<b>362</b>

# 导 言

## 一 选题意义

自满人入关，定鼎北京，建立清王朝的统治后，就确立“首崇满洲”的原则，赋予人口占少数的八旗旗人以种种特权。雍正初年，又创设军机处，作为决策核心，不仅内阁大学士丧失了实权，即使是体现满洲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形同虚设，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加强。经过乾隆朝，清代典章进一步制度化，迨道咸时期未有变化。乾隆时的军机大臣多为满人，前有傅恒，后有阿桂，领枢执政数十年；权臣和珅更是受到乾隆信任，充分表明满洲权贵在清朝政权中的特殊地位。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有了一些变化。

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的辛酉政变是晚清政局的重要转折。在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被整肃后，代之而起的是慈禧、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入枢辅政的权力格局和政治运行机制。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死去（慈安先于光绪七年病逝），其间慈禧太后一直是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核心。她通过培植亲信、控制军机处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掌控，并通过调整军机大臣乃至全盘易枢的极端方式来巩固自身的权威，杜绝大权旁落的任何可能性。在此期间，军机处通常由懿亲领班，一两位军机大臣主持局面。这样，在慈禧、领班亲王、军机大臣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可调整的动态的权力结构；当同治、光绪帝相继亲政后，权力关系虽然多了一层，但慈禧掌握最高权力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是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因为帝后分

歧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变化，更具复杂性，甲午战争之后的政局便集中体现出这个特点。

同光时期领枢的亲王先后有恭王奕訢、礼王世铎（实际过问政务的还有醇王奕譞）、庆王奕劻，而军机大臣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刚毅、荣禄、瞿鸿禨等则被视为不同时期主持军机处的核心人物。研究这些与慈禧关系密切的重臣，梳理政治派系的分合，解读一些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可以提纲挈领地抓住朝政演变的症结，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因而，近代以来，对这些“秉国权臣”的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光绪十年的甲申易枢、甲午战后孙毓汶倒台及戊戌年春翁同龢开缺等政治事件，都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比较而言，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义和团事件前后，满洲重臣荣禄深受慈禧信任，与政局牵涉最大，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本书选择荣禄作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光绪二十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不仅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改变了东亚外交格局，也改变了甲申易枢后的政局：孙毓汶、徐用仪等人退出军机处，直隶总督李鸿章开缺回京入阁办事；甲申易枢时受挫的恭王奕訢、翁同龢、李鸿藻重返枢垣；另一位满族官员刚毅后来居上，先入中枢，成为新贵。此时的荣禄，虽未入军机处，但慈禧对其信任程度毫不逊于枢臣。甲午战争时期设立的督办军务处，在战后并未裁撤；身为督办大臣的荣禄，实际主持督办处，对战后营勇裁减、新军建立、铁路修建等新政事务，拥有充分的权力，威望几乎与军机大臣相比肩；短短两年间，他以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很快升任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是当时满汉臣僚中升迁最快的一位。到丁酉（1897）、戊戌（1898）之际，李鸿藻、恭王奕訢先后去世，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荣禄成为最受慈禧信赖的重臣。戊戌政变后，他由直隶总督任上回京入枢，主持大局，并开始编练武卫军，执掌军权；庚子两宫流亡西安期间，甚至一度充任领班军机大臣。直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去世，荣禄一直是影响清廷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

但是，既往学界对荣禄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等一些具体问题上，评判也过于简单，泛论多于实证。不少观点以讹传讹，影响迄今。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仍被视为戊戌维新中止的关键原因；庚子年（1900）五月荣禄向慈禧呈递假照会，仍被视为导致清廷

对外宣战的导火线；有论者对荣禄暗中保护使馆的作用也明显有夸大的成分。总之，有关荣禄的总体研究推进得十分缓慢。

有鉴于此，将荣禄一生事迹和经历贯穿起来，置于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和分析，寻找其行事思想和行为逻辑，对其一生经历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和评判，正是本书所要努力的方向。从荣禄与晚清政局演变的关系来切入，既可知人，又可论世，有助于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荣禄是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改革的大力倡导者和实际主持者。尽管甲午前西化的军事改革已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但推行过程却十分缓慢。从胡燏棻定武军、袁世凯新建陆军到后来的武卫军，这些新式军队的创办都是在荣禄推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反映出荣禄致力于近代军事改革的理想；从这个层面看，他是甲午战后的主张改革者，简单地将其视为顽固守旧者与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的宣传有很大关系。

第二，荣禄身居中枢，与满汉、南北、新旧各派政治力量关系微妙，是沟通各派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前后调和两宫关系、维持朝局稳定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此，不能把康、梁的宣传作为依据。荣禄在大胆任用袁世凯等汉族官员的同时，又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这与后来载洋摄政时期满洲年少贵族力图专权而一事无成有明显区别。

第三，荣禄与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的关系，虽有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极为分散的局限和一些旧说先入为主的影响，不少细节不甚清楚，很多说法以某些私人笔记乃至野史为立论依据，总体评价有待调整。大量事实表明，政变后荣禄与刚毅之间的矛盾，是解读这个时期朝局演变的主线索。

第四，以往对荣禄从西安回京后的政治境遇研究很不充分。《辛丑条约》签订后，荣禄随同两宫回到北京，虽然权势依然显赫，但病势日重，又受到朝野各种政治力量的攻击，一直碌碌无为。荣禄去世后，受到清廷的恤典虽优厚，但中外舆论对其褒贬不一。此后清廷进入奕劻秉政的预备立宪时期，不少因由需要从荣禄执政时期来追根溯源。

总之，对荣禄这个关键人物做全面研究，梳理甲午战后朝野派系斗争的脉络，对于我们把握晚清政局演变的整体态势和基本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 二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第一，关于荣禄的传记和总体性的研究。

人物传记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60年代，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该书在1980年出版增订本）中，将荣禄作为反对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立传，列于慈禧传之后，引用档案、报刊、笔记、碑传文献等，叙述其一生经历，但侧重戊戌时期，对荣禄做了基本否定的评判。<sup>①</sup>

到了90年代初，美国学者A. W. 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2*）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出版。按，该书英文版40年代出版于华盛顿，其中《荣禄传》系由华裔学者房兆楹所撰。房文对荣禄一生不同时期事迹所做的叙述和概括较为详细，兼及世人关于荣禄评价的分歧；并依据近人金梁的《四朝佚闻》，指出《景善日记》是伪造的，“目的在于把荣禄打扮成洋人的朋友，从而洗刷他对围攻使馆所负的一切责任”。该传的结论称：“老实说，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和地位，而非国家大事。他之起家掌权，并非由于他本人建有殊功，而是由于奕訢（似是奕譞——引者注）和孝钦皇太后的宠信。奕訢（奕譞？）视之为门下客，孝钦则视之为驯服的工具，他因此而得宠。尽管1898~1903年，他本有可能在清廷内部起有益的影响，但他未运用他的权力促进国家的利益，也未能有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sup>②</sup>显然，也对荣禄做了基本负面的评价。这篇传文写作时参考了一些美国外交文献和外文论著。

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戴逸领衔、清史编委会编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其中收入了林敦奎所撰《荣禄传》。该传侧重于戊戌、庚子时期荣禄事迹的评述，基本上从“革命史观”角度立论，对其持否定态度。<sup>③</sup>这

①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2，第521~528页。

② 参见A. W. 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426~435页。

③ 参见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43~52页。

与房兆楹的视角明显不同。

知人论世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从荣禄与晚清政治这个层面来研究和考量，较传记更为深刻。对此，张玉芬在20世纪80年代对荣禄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学界的基本观点。文章虽缕述荣禄的简历，仍将其政治活动的重点放在戊戌、庚子时期。作者批评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站在慈禧一边，“肆无忌惮地反对康梁的维新变法”，充当慈禧扼杀维新运动的“打手”；政变后又为慈禧出谋划策，立溥儁为大阿哥，以逐步取代光绪帝；庚子事变中虽不赞成慈禧、载漪等人“对外主战、对内主和”的决策，但是为了保住权位，采取左右逢源、首鼠两端的做法，对进攻使馆的谕旨阳奉阴违，明攻暗保，为清廷后来的乞和谈判留下了余地。后在谈判中与奕劻、李鸿章极力为慈禧开脱，避免受到列强追究，从而更受慈禧信赖。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甲午战争中荣禄主张“先以战为根本，而后能以和戴事”，提出募重兵、用宿将等措施应对时局；战后又倡导练兵自强，变通武举，创建武备学堂、编练洋队新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与顽固派有所区别。<sup>①</sup>实际上对荣禄参与甲午后的军事改革给予了比较明确的肯定，这是与以往观点不同之处。

比较而言，王刚的博士学位论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历史系，2014）对荣禄与清末政治及其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和个别问题的分析方面明显超越以往；尤其对荣禄与神机营的关系、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荣禄幕府及其贪腐情况等探讨较为深入，且有创见。当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和有待深化研究之处。<sup>②</sup>

第二，关于荣禄与戊戌变法和政变的研究。

过去很长时间内，近代史的研究呈现出以政治史和事件史为中心的特点。对荣禄的研究，更多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把他作为慈禧镇压变法的“帮凶”，基本上是反派人物的形象。以往讨论较多的是荣禄与政变的关系，即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和慈禧训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富悬念的题

① 张玉芬：《论晚清重臣荣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② 参见王刚《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此外，可参考冬烘刚（王刚）《荣禄早期生平考（1836~1879）》，《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荣禄与晚清神机营》，《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从〈荣禄存札〉看晚清官场请托》，《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目，一直很受关注。几十年来，台湾学者刘凤翰、黄彰健和大陆学者孔祥吉、茅海建先后做过相关考订，都是针对政变过程中荣禄的表现展开的。由于档案资料的深度利用，该问题的研究在史事层面已有新突破，所谓荣禄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后秘密回京策动慈禧发动政变的传统说法，已被证明不可信；就现有史料而言，荣禄坐镇天津与京城满洲权贵庆王奕劻等策划训政的史事基本上已经澄清。<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后期，学界开始探讨荣禄的改革思想以及对戊戌变法的态度。胡绳指出，“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訢、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即慈禧太后——引者注）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sup>②</sup>显然，胡绳认为荣禄不能简单归入守旧一派中。李毅认为，戊戌时期荣禄作为“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人物”，自始至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奏请举办新政，主张实行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改革，多与康、梁的变法有一致的地方；如果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话，荣禄更接近于洋务派。他的改革建议主要是在军事制度方面：一是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选拔人才；二是用洋操训练新式军队，以成劲旅。此外，还主张兴办学堂、发展农工商业等；又保举维新派官员陈宝箴为湖南巡抚，支持兴建芦汉铁路，等等。上述建议和举措与光绪帝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上谕大致相符，反映的是洋务派的改革内容。但是，作为“后党的中坚”，当维新运动危及封建统治时，荣禄又与顽固派联合起来，坚决予以镇压。<sup>③</sup>该文有限度地肯定了荣禄在戊戌时期的改革主张，与胡绳的观点基本

① 参见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第139~189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605~661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390~439页；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当然，个别细节方面各位学者仍有歧见，但不影响这个基本结论的得出。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全书》第6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第561~562页。

③ 参见李毅《荣禄与戊戌变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一致，这与将其完全斥为守旧人物加以否定的观点区别很大。

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冯永亮利用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珍稀文献《荣禄函稿底本》，对百日维新期间荣禄的政治思想做了细致的实证性考察，指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在推进“变法的权力、次序和方法上”与康、梁一派有明显的分歧；作者还指出，政变后荣禄回京主持军机处，“努力将政变的冲击和影响减到最底〔低〕程度，同时仍有条不紊地将其变法主张和措施付诸实施。清朝末年出现的新政，某种程度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sup>①</sup>荣禄在政变后继续主张图强御侮，并避免一些改革措施中辍，表明了荣禄高于刚毅等顽固守旧大员的见识。这启示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从甲午战后的军事改革到庚子新政，对于荣禄而言是否有着一以贯之的改革思想，这也涉及如何评价甲午后的自强新政、戊戌维新及庚子新政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综合30年来的研究状况，学界对戊戌时期的荣禄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评价和基本否定的思路，研究渐趋实证，评价也趋向客观全面。

第三，荣禄在己亥建储和庚子事变中的态度和表现。

荣禄在己亥、庚子年间的活动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学界研究的分歧也最多。因为牵涉的人事关系复杂，私家记述彼此矛盾，论者各执一词，争议一直不断。“己亥建储”是政变后朝局动荡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李守孔认为，戊戌政变后守旧诸臣密谋废黜光绪帝，遭到各国反对，慈禧衔恨之余，只得听从荣禄的意见，采取先“立储”的缓和措施；荣禄此举非“有爱于”德宗，而是因为畏惧外力之干涉而采取的折中办法。<sup>②</sup>郭卫东则认为，戊戌训政后情况有所变化，荣禄从帝党的反对者一变而为光绪帝位的保护人，因为他已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政局再发生变动而出现新的权力分割。他力谏慈禧放弃废立图谋，立大阿哥，以延缓废立，并主张为光绪立嗣“兼祧穆宗”，暗中维护皇帝。庚子年荣禄与载漪等人在政治上出现对垒，与此也有直接关系。<sup>③</sup>

史料的辨伪与史实的认定每每相交织。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围绕

① 参见冯永亮《荣禄与戊戌变法》，《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李守孔：《光绪己亥建储与庚子兵衅》，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3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3~71页。

③ 郭卫东：《“己亥建储”若干问题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景善日记》这份史料真伪的讨论也牵涉荣禄与庚子事变的关系。程明洲曾撰文，旁征博引，指出《景善日记》系伪造：“味其文意，殊多左袒荣禄之嫌”。作者进一步写道：“察《景善日记》，每述及荣禄，必曲情谀之，主立大阿哥，反对废帝，一也；允洋人入京保侨护使，二也；不信拳团，三也；力主护送使臣侨民出京，四也；拟议停战，五也；拒给董军大炮，六也；同情诤臣，七也；主惩载漪以挽危局，八也；信如是说，则以一柔奸险滑之人，其忠贞竟等许、袁而上之，宁非可哂之事？”<sup>①</sup> 言外之意，《景善日记》似是有人为荣禄脱罪而编造的。多年后，毛以亨再次梳理《景善日记》中、英文不同版本的传播情况，指出程明洲的主要观点其实源于英国人刘逸生（William Lewisohn）所撰《对所谓的景善日记的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一文，该文发表于1937年的《华裔》杂志（*Monumenta Serica*，辅仁大学主办），强调程氏本人的“新发现”并不多。同时，毛氏明确指出，《景善日记》是英国汉学家白克浩司（也译白克豪斯，巴克斯，或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1873-1944）受荣禄委托假造的，目的是为荣禄开脱罪责，免除战犯嫌疑。<sup>②</sup>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员在访问英国时，借阅了保存于伦敦英国图书馆的《景善日记》原稿，并撰文对此案再做评判，认为日记确系白克浩司造假，但并无刻意为荣禄辩解的意图；之所以过多描述荣禄，是因为他是慈禧的心腹，“为人机诈、阴鸷、善变，富有统治经验，善于玩弄权术”，白克浩司为了使日记生动，富有戏剧性，“所以通过景善这个老朽之口把当时处于关键地位的荣禄突出出来”。<sup>③</sup> 这个结论受到学界关注。此外，台湾学者戴玄之也对流传甚广的罗惇融《拳变余闻》中所收《董福祥上荣中堂稟》进行考订，认为这封意在证明董攻使馆是奉荣禄之命的史料是伪造的，目的是嫁祸荣禄而为董洗刷罪名。<sup>④</sup> 史料

① 参见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者》（此文最早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载吴相湘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7册，台北，正中书局，1956，第229、244页。

② 毛以亨：《所谓景善日记——批评之批评》，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5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第35~44页。

③ 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④ 参见戴玄之《董福祥上荣中堂稟辨伪》，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第181~191页。另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64~190页。另，掌故学家徐一士也曾指出：“尝闻人言，此臆鼎也，福祥实无此。细按其文，亦觉不甚类，殆当时恶荣禄者之拟作耳。”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222页。